·科海无涯·

哈伯毁于狂热

□陈洁

专栏

陈洁 科普作家,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著有《山河判断笔尖头》《何以科学家》等。

1915年4月22日,比利时西南部的古老小镇伊普雷,“一战”正打得如火如荼,英法联军和德国兵在这里僵持不下。

下午,风刮起来了。英法联军突然发现,一堵长六公里、高两米多的黄绿色气体墙,正从敌军阵地出发,顺着风、贴着地,迎面移动过来,随即降入战壕,停滞下来,覆压十多公里。士兵们很快感到鼻腔和喉咙刺痛,剧烈地咳嗽、呼吸困难、胸口疼痛,然后窒息倒地。

这种士兵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武器”,是氯,它能溶解于上呼吸道黏膜和眼球里的液体,生成次氯酸和盐酸,使人体组织强烈氧化。据事后统计,5000多人死于这次战役,15000人中毒后出现肺水肿、腹泻,数千人双目失明。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杀伤性毒气大规模投入战争,是现代化学战的开端。

化学战的始作俑者,是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伯。哈伯平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发明了人造合成氨。随着农业的发展,氮肥的需求量迅速增长,哈伯设法将空气中的氮气固定下来,并且和氢气反应,合成氨肥。世界上第一次有了人造肥料,人类不再受限于天然氮肥,世界的农业发展有了强大的后盾保障。

可悲的是,合成氨同样也是火药的原料。有了哈伯的垄断技术,占整个大气78.03%的氮气,变成了德国最富足的军火储备原料,而且可以节约巨额的军费开支。德国不必再依靠从智利进口硝石来保障火药生产。

发展了量子力学的德国物理学家玻恩写道:智利的硝石出口在战争爆发之初就被封锁了,“如果没有哈伯的发明,德国人很可能在开战六个月后,就会因为缺乏炸药而失败。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思想和技术能力就是世界史的决定因素”。

如果没有哈伯的发明,威廉二世在考虑发动战争时也许会更加谨慎。

当然,发明被运用于何处,并不必然是科学家的责任,人们并没有因为诺贝尔发明火药、爱因斯坦论证原子弹而诋毁他们。但哈伯不同。哈伯的邪恶在于,他狂热参与军事工业的科研生产,而且直接发动了毒气战。他甚至特意坐飞机低空观察毒气释放后的效果,为其巨大的杀伤力欢欣鼓舞,为改进毒气弹的性能收集第一手资料。

恶之所以为恶,不仅因为它自身为恶,更在于它能诱生更多的恶、激发更大的恶。底线一旦被突破,参战各国争相研制和使用化学武器。整个“一战”期间,化学武器造成近130万人的伤亡。

哈伯的妻子克拉拉是第一位取得化学博士学位的德国女性。她没能阻止丈夫研制毒气,在绝望、愤恨和道德自责中,她饮弹自尽,死在独子的怀里。

她咽气后的第二天,哈伯一大早就开赴东方战线,部署毒气战。当一个人有了“最高价值”,就会这样不惜任何代价、做出任何事来。

战后,因为害怕被当作战犯抓捕并接受军事审判,哈伯逃到乡下躲了半年。后来,哈伯远离政治和战争,全力投入常规的科学研究当中。

历史荒诞而吊诡。“情怀”使哈伯留下历史的污迹,这份感情又反过来唾弃了他。

1933年,德国人基于强烈饱满的“狂热”,将犹太人哈伯驱逐出境。他被迫放弃自己的研究所,离开他深爱的祖国,逃往曾经的敌国英吉利,向剑桥大学寻求庇护。一年后,在度假途中,他因心脏病发作死于瑞士。

早逝是他的幸运,“一战”中的战争狂人哈伯没有看到二战,犹太人哈伯也没有死在集中营。不过,集中营“浴室”(毒气房)喷头释放出的气体里,有他研制的芥子气。

·序跋集·

且从底色看真颜

□江晓原

摘编自科学史学者江晓原为吴晓京新书《科学的底色》写的序言。

吴晓京教授是我表弟(我姑母之子),我们两人的生活轨迹,有过一些温馨的交集和巧合。

1999年,我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在那里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没想到两年之后,晓京也来到了上海,他被复旦大学引进,成为材料科学系教授,从此我们又在同一个城市工作和生活。不过因为两人专业相隔颇远,我们在学术上并未合作过。

这次晓京的著作《科学的底色》出版,征序于我,我当然无论如何也不能推辞。他这部著作不研究材料学,而是一种“跨界”之作,是一部带有科学史/科学社会学色彩的作品,我认真拜读之后,十分欣喜,决定真的来“置喙”几句。

在《科学的底色》的前4章中,晓京花了不少篇幅阐述近代科学形成和产生的社会背景。他的这些思考,和科学史圈子里常见的叙事相比,新意迭出,胜义时见。这很可能来自他作为一个“越界狩猎者”的有利之处——他不会过多受到科学史圈子里传统叙事的影响和束缚。

例如,他不赞成“一些科学史研究者试图告诉人们,科学革命之所以发生在欧洲,是因为欧洲有着深厚的科学土壤,有着科学的传统”。而这些科学史研究者为了论证欧洲的科学传统,就认为西部欧洲(即一些西方学者说的“拉丁西方”)是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的继承者。对此晓京也不赞成,他举了三条理由:

为何在近千年的时间里,在“浸润在两希文明中”的基督教世界(包括东正教)没有发生科学革命?

拜占庭帝国有近千年时间掌握着丰富的希腊文献,是两希文明的直接继承者,文明程度明显高于黑暗的拉丁西方,为何也没有发生科学革命?

崛起于公元7世纪的伊斯兰文明,大量翻译古希腊文明的著作,为何也没有发生科学革命?

晓京还特别指出,我们不能从科学革命最终发生于西欧这个事实,就推论出这场革命只能发生于西欧。

讨论科学革命可以说只是热身运动,更大胆、更深刻、更有价值的讨论集中出现于本书第5—9章。

晓京正面论述了这样的观点,曾经有很长时间,世界处在“有技术,无科学”的状态中,所以技术的历史比科学更早、更长,技术也不需要以科学作为基础和前提。

例如,关于工业革命中的三大产业技术革新,纺织珍妮机、蒸汽机、蒸汽轮船和蒸汽火车,已成为论述工业革命时的老生常谈,但是晓京却指出:“这些技术的发明者,推动这些技术发展的社会动力,都与当时的科学界关联甚微,没有一位接受过完整的系统教育、受到过科学训练。”

又如,晓京认为,要取得足以开辟新产业技术的科学突破,“是一件极为困难且可遇不可求的事”,诺贝尔科学奖越来越多地颁给了技术突破,“诺贝尔奖事实上日益成了技术进步奖”。他认为这正说明了技术与科学之间的现状——“技术的发展状况优于科学的发展状况”。所以他的结论是:

技术的出现远早于科学,它的发展为科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没有这一基础就不会产生科学,而不是相反;科学出现后,成功地把某些与技术相关的知识科学化,使之成为科学的技术;科学的技术是技术的一个子集……科学不是技术产生及进步的必要条件。

至少在大众科学传播的层面,这样的论述还是极为罕见和珍贵的。

·门外弹乐·

生命绝唱犹然在耳

□梅明蕾

梅明蕾 媒体人,爱乐者,读写驳杂。

印象中,在当代古典音乐界,还没有谁像英国传奇大提琴家杰奎琳·杜普蕾那样,其多舛的命运与难忘的演奏形成巨大反差而令人唏嘘。今年恰逢她诞辰80周年,回顾她的人生经历,重温她独一无二的琴声,正可在爱乐者心中激荡起怀念伊人的浓浓情愫。

先极简勾勒一下杜普蕾的人生吧:1945年1月26日出生于英国牛津的一个音乐之家。5岁开始学习大提琴,11岁赢得苏吉亚奖(the Suggia Award),成为全英国最受瞩目的演奏家。1965年因与伦敦交响乐团合作演出埃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奠定了其在演奏舞台上的地位。1967年与阿根廷籍钢琴家巴伦博伊姆结婚。1973年被确诊罹患多发性硬化症,遂告别舞台。1987年10月19日去世。

笔触再简略,用词再平淡,也难掩杜普蕾短暂人生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如今巴氏作为钢琴家和指挥家的双料大师在古典音乐界正如日中天,而“她比烟花寂寞”却成为后人对杜普蕾的写照。音乐神童杜普蕾,大提琴演奏技术早早出类拔萃,最突出特点,在于情感表达真挚而强烈。她演奏的代表作公认为埃尔加的《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这是作曲家毕一生之力创作的最后的大型管弦乐作品,常被认为是埃尔加献给已逝妻子的安魂曲和自己的“天鹅之歌”。作品情感充盈,情绪表现张力甚大,其间又充满对人生和世界的思考,理性与感性的尺度拿捏不易把握。杜普蕾的音响调色板上,带有深厚生命体验的全情投入是底色,在其上调制、铺陈出庄严、沉重、悲怆、忧郁、凄美等斑斓色调,一出手,便让人感到这部经典就是为她量身定做;她以舞台上的瞬间,构筑起音乐史上的一个永恒。

杜普蕾在公众面前演绎这部杰作时不过年方二十,尚浅的阅历与其展示出的作品深度似不匹配。那时就有人称杜普蕾是用生命在演奏。最有名的故事,是说匈牙利大提琴家史塔克听广播里正播放大提琴曲,询问演奏者后被告知是杜普蕾。史塔克当场感叹:“像这样演奏,肯定活不长久。”也许顶尖的同行才能识破生命与艺术相联结的深层密码,而史塔克终究一语成谶,杜普蕾的琴声在42岁时便成绝响。

杜普蕾演奏的曲目单颇为丰富,埃尔加之外,德沃夏克、舒曼、舒伯特、圣桑等均为她所爱。她也是室内乐的积极参与者。流传最广者,当是她与钢琴家巴伦博伊姆、小提琴家帕尔曼、中提琴家祖克曼和贝斯演奏家祖宾·梅塔(后成为指挥大师),于1969年8月30日合作演奏的舒伯特的钢琴五重奏《鳟鱼》。这5位当红演奏家,不仅技艺精湛,且彼此间结有深厚友谊,尤其新婚才两年的巴伦博伊姆和杜普蕾夫妇,更在这深度的默契配合中享受着爱的滋润。这场演出被广泛谓为经典,音乐因素之外,应有爱情和友谊的助力。

1971年的一次演出中,杜普蕾在演奏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时突发手指非正常抖动,以致乐器差点脱手。后经检查,才发现自己不幸患上多发性硬化症,这在当时属不治之症。病情不可逆转地拽着杜普蕾向死神靠近,直到她最后一次演出被夫君抱上舞台,终于42岁在伦敦家中病逝。一颗璀璨的明星就此陨落。

用生命演奏,或是杜普蕾短暂的一生留给世人最深刻的印象。不谈生命的长度和亮度并存的两难,只说音乐,其最本质的规定性还是打动人。我们纪念杜普蕾,尤在这音乐表演崇尚炫技的时代,不忘这素朴的本质。

外卖骑手超时,你该不该原谅

《数字疾驰:外卖骑手与平台经济的劳动秩序》
陈龙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近日,京东、美团、饿了么相继宣布为部分外卖骑手缴纳社保,外卖骑手的劳动和福利状况再次引发关注。上海人民出版社新书《数字疾驰:外卖骑手与平台经济的劳动秩序》中,北大社会学博士陈龙“卧底”送半年外卖,与算法“近身肉搏”,揭示了数字控制之下新型的劳动过程和劳动关系。

在写字楼、高校、新老社区环绕的中关村商圈,活跃着一个八百余人的外卖骑手“兄弟连”。某天,北大社会学博士陈龙骑上电瓶车,加入“兄弟连”,与他们并肩疾驰。他想了解:看似自由和灵活的表象下,平台如何巧妙地隐藏对骑手的精细控制与管理?当人与代码短兵相接,所谓“打工”,又在经历怎样的变化?

基于细致的观察,特别是当外卖骑手的亲身经历,陈龙用生动、细腻、诙谐的笔触,让我们看到骑手日常的辛苦、焦虑、玩笑、失望,让我们看到这一个个疾驰的背影之后的技术系统、经济关系和社会运作。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周飞舟评价:本书是通过参与式观察来进行社会研究的优秀作品,充满了只有身在其中才会触发的感受、体验与社会学研究者的洞察、想象,是一本深度反映时代变化的历史记录。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爱玉认为:《数字疾驰》是一本有温度、有厚度、有情怀,能够将人带回劳动社会学研究中心的好书,极大地推进了劳动社会学基于拓展个案法的劳动过程理论。

【书摘】

为什么会超时?

毫不夸张地说,时间在整个外卖配送过程中始终居于核心位置。骑手在劳动过程中的一切对象和互动都是围绕时间展开的,更准确地说是围绕“时间快”展开的。尽管平台系统功能强大,拥有超级计算能力,能在短短的几秒钟时间就完成线上的交易、支付以及匹配外卖骑手的工作,但是最终决定配送时间长短的,还是线下的外卖骑手以及和骑手相关联的商家(出餐快慢、打包服务员效率等)、保安(停车难、上楼难等)、交警(查违章、红绿灯)和顾客(取餐速度、电梯快慢等)。

那么究竟什么会导致骑手超时呢?简单总结就是:派单多、出餐慢、送餐难。

首先,从派单来看,骑手每天的接单量随时间变化基本呈右偏分布的形态。因为骑手的工作时间大致是从上午9时到晚上9时,高峰期出现在上午11时到下午2时之间。因此每天的接单量并不均匀,主要集中在中午的高峰期。在这期间,由于订单量激增,平台系统会进入疯狂派单状态,骑手接收起订单来也会应接不暇。通常骑手送一个订单的时间根据距离远近在25—50分钟之间,但由于高峰期系统不停地派单,骑手手里积压了大量订单,在订单时间重叠效应的影响下,每个订单的送餐时间就会成倍地压缩。送餐时间越短,骑手超时的概率也就越大。

其次,从取餐来看,餐厅出餐慢是首要原因。餐厅刚开张的时候,容易出餐慢,因为餐厅各项准备工作才开始;中午高峰期的时候,也容易出餐慢,因为高峰期除了满足订单需要外,餐厅还要招待到店的顾客。骑手到店以后等很长时间都取不到餐,以至于很多出餐慢的餐厅早就在骑手心里上了“黑名单”。

最后,从送餐来看,取餐后的骑手就要开始一路的“打怪”送餐之旅。首先,路上的红绿灯和随时可能出现的交警是骑手事先无法预料的。但是像中关村商圈里的红绿灯,骑手往往熟视无睹,因此闯红灯司空见惯。面对红灯,顾少聪会说:“你不闯红灯,就挡了后面要闯红灯的骑手的路。”于是在商圈内几乎没有骑手会真的停下来等红灯。但对于像北四环和中关村大街交界处的红绿灯,骑手就不得不等候,只不过他们也会伺机闯红灯,往往在没有大车的情况下,只要有一两个骑手带头,其余的骑手就会随大流闯红灯。

到达送餐地点以后,骑手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停车难”的问题。好不容易进去以后,摆在骑手面前的第三个难题就是“上不去”或“下不来”。高层的电梯上下运转一趟需要很长时间。

还有些地方不允许骑手上楼,譬如国际创新大厦、银网中心、微软大楼等等,顾客就需要自己下楼取餐。不用上楼看似给骑手节省不少时间,但事实上经常事与愿违。因为顾客下楼的时间难以控制。有一次我在国际创新大厦下面就遇到一个骑手,不停地捶胸顿足,嘴里不停地嚷嚷着:“哎呀,怎么还不下来,气死我了,他在干什么啊,哎呀急死我了,还不下来,气死我了。”

总之,因为派单多、出餐慢和送餐难,骑手免不了就会超时。但不管什么原因,在见到顾客时,骑手还要毕恭毕敬,万分歉意地给顾客赔不是,毕竟的确超时了。骑手在顾客面前的态度直接决定了顾客对骑手超时行为的包容程度。要是顾客不满意,一个差评或投诉,骑手可能好几天就白干了。因此,骑手经常会两头受气。一头就是顾客,如果遇到不好说话的顾客,骑手要一个劲儿地赔不是。因为态度好、姿态低是避免差评的关键,即便被顾客数落两句,骑手也无话可说,其间的心酸和委屈,恐怕只有骑手自己心里最明白。另一头是餐厅。餐厅的前台和后厨也像顾客一样不好惹。出餐慢,骑手就催前台,前台就去催后厨,后厨则爱答不理,催的次数多了,后厨不理前台,前台就把气转嫁到骑手身上。顾少聪以他曾经在饭店打工的经历告诉我:“别看他们(前台和后厨)都是一家饭店的,矛盾多着呢。”骑手虽然和前台在互动关系中是平等的,但是奈何前台控制着订单,骑手没拿到餐以前,只能央求前台催一催或者赶紧打包,有时候遇到“高冷”的前台,骑手仿佛“对着空气讲话”,因为前台连理都不理。骑手催急了,前台敢直接朝骑手怼回来:“催什么催!再催不装了!”

除了上述外在原因以外,对于超时,骑手并非完全没有责任。骑手的贪心是造成送餐超时的重要原因。因为骑手总是想尽可能多地拿订单,对于系统的派单也总表现出一副来者不拒的样子。但是订单多了,相对送餐时间就缩短了,超时的风险自然也就增加了。这种超时,就是骑手由于自身原因造成的。

唐伯虎从至暗时刻挣扎走向重生

《唐伯虎传》是艺术史学者孙炜10年研究积淀创作的一部人物传记。

提到唐伯虎,我们会想到他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的形象,还会与电影《唐伯虎点秋香》联系起来。然而,历史上的唐伯虎果真如此吗?他少年得志,却连遭四位亲人离世的打击,悲痛中科考夺冠却因舞弊案前程尽毁,紧接着又遭婚姻失败。人到中年作《桃花庵歌》,字里行间尽是历经沧桑的悲凉。若不深入了解,我们很难将他表象的风流与父母早亡、丧妻丧侄、继室反目、理想幻灭、卖画谋生、落拓不羁、悲情离世的苦难人生勾连起来。

唐伯虎一生八卦不少,谜题争议至今——“唐伯虎点秋香”是否确有其事?“科场舞弊案”告密者究竟是谁?因生计所迫,唐伯虎既做书画家也做商人还做过掮客?他与王阳明所处同一时代,二人究竟关系如何?据说他晚年有大量代笔之作,这些画作的代笔者又是何人?以及其真伪画作流转背后都衍生了哪些故事?这些话题扑朔迷离,争议至今,真相究竟如何?

为还原真实的唐伯虎,作者结合百余幅高清古画,从传记史、艺术史、收藏史三条主线切入,对唐伯虎的人生细致讲述。经由其跌宕短暂的一生,我们得以看到江南文艺界群英云集、交游唱和、吟诗作赋、饯别往还的雅集盛况,吴越之地文化兴盛、书画收藏蓬勃发展的社会面貌,以及明中期科考场、文艺圈、官僚界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人际交游。

作者以晓畅文风,带我们走进唐伯虎这颗纯粹的灵魂与他传奇的人生,不仅使我们一览明中期江南文化艺术领域的发展盛况与社会风貌,也让我们深入了解命运困顿的唐伯虎是如何从至暗人生竭力挣扎走向重生,在人格精神与艺术领域重塑了留给后世的印象,为我们观照自身提供了鲜活样例。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整理)

【书摘】

蓦然回望,历史就在那儿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艺术品收藏高峰期,出现在明朝中后期,而唐伯虎和董其昌,这明代两大才子,就身处这股艺术品收藏的浪潮之中。他俩一头一尾,遥相呼应。他们对艺术的贡献及对后世的影响,飞鸢绝迹,声震古今。

窃以为,在中国书画史和艺术品收藏史领域,凡涉及传统书画艺术品的真、假、优、劣等核心问题,始终绕不过一个历史人物。这个人就是董其昌。

董其昌是晚明极具争议的大才子。此公的确是一位划时代的艺术史论大家、一位集大成的鉴赏大师、一位影响深远的书画名家、一位治学严谨的史学家,更是一位成功的书画商人。在生前,他就已被推崇为一代鉴赏宗师。将其誉为中国艺术与收藏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实不为过。

这样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在他谢世近四百年以来,居然没有一部完整的传记,以致后人想要了解他的生平或者研读他的作品时,只有散碎的资料供参考。于是我开始收集、梳理和研究有关他的所有史料,以自己在历史学、书画鉴赏学以及传统绘画理论等方面的有限知识为依托,最终完成了《董其昌传》。

《董其昌传》问世之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抬爱,在众多媒体的采访和报道中,登上了数十种好书榜,这是对我的一种鼓励。

早在撰写《董其昌传》之前,我就已经开始收集《唐伯虎传》的各种史料,前后历时十年。因为我始终认为,如果把明朝掀起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艺术品收藏热潮比作奔流的大江,那么,唐伯虎显然已立于涛头,鹰扬天下;董其昌则涉于江尾,独步千里。隔着时空,首尾呼应,尽是风流人生。

《唐伯虎传》
孙炜 著
中信出版集团

我写唐伯虎和董其昌,看似专注于单一的人物,实则将他们融进了时代的大环境之中,谨慎地剔除掉那些关于天才的夸大其词的史料,尽量体现出他们平凡而鲜活的生活,并以此来探究他们生命发展的真实过程。所以,我认为自己所写的不仅是个体的传记,更是明代艺术品收藏高峰期的发展历史。

任何事物必有始终,其中包含着规律性的脉动。比如弘治中兴时实施的盐法改革,导致商人们争相主动交税,仅此一项,就使得弘治年间年均财政收入是永乐年间的8倍之多。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一幕。这就是唐伯虎所生活的年代。

从本质上来讲,读书与写作本是一回事,目的都是探究事物的真相,让书中人物和作者的生命都具有现实意义。人类历史的发展脉络是一条线性的时间轴,我们站在中间,向前看,是未来;往后看,是历史。我自小就接受了这样一种史观,那就是历史总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未来必定更美好。可是,当今世界的变幻莫测改变了我的认知。我理解的人类真实的视角,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看过去,看那些已经发生过的历史。

快览>>>

《中国数字人文发展报告(第一辑)》

冯惠玲主编 夏翠娟 梁继红副主编 中华书局

该书是首部对中国数字人文领域进行全面介绍、探讨、审视的著作,全面综述中国数字人文发展历程,鸟瞰我国数字人文整体样貌,选择了语言文字学、文学、史学、历史地理、艺术学等人文学科,以及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数字记忆与数字重建、技术与产业界发展等专题进行论述。

《中国经济2025:稳预期、促消费与扩内需》

刘世锦 黄奇帆 黄汉权等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5年将“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运行的逻辑正在经历新的调整与转变。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怎么看、怎么干?本书对当下经济发展的制度背景、问题挑战和发展方向做出全面分析,帮助读懂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精准把握当下及未来发展方向。

《中国濒危语言志》(第一辑、第二辑)

曹志耘总主编 商务印书馆

安徽祁门军话、广东电白旧时正话、湖南道县梅花土话、湖南宁远平话、陕西延安老户话、福建武平军家话……我国自2015年起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中国濒危语言志》作为工程标志性成果,采用现代化技术手段调查记录和加工保存濒危语言,具有原创性、抢救性、存世性、可比性、可多次开发利用等特点。

《西方设计史上的中国风》

袁宣萍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17—18世纪,西方设计史上曾流行过一种特殊的装饰风格,称为“中国风”。中国风是西方对东方的浪漫想象与异化表达,借鉴了同一时期中国外销艺术品风格。这种风格在18世纪后期衰退,但其余韵一直延续到今天。本书对此作了专题讨论,有助于读者了解历史上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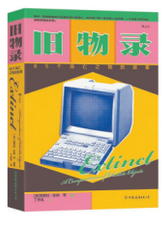
《英语史》

[美]艾伯特·C.鲍 托马斯·凯布尔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英语史》探索了从罗马征服英格兰至今的英语语言和文化发展。该版本是作者第六次修订再版,新增了“21世纪的英语”的一章,更具有时代性。作者指出,要理解当今的英语,并对影响当今英语的问题持开明的态度,最可靠的基础是了解英语发展至今所走过的道路。

《旧物录:85个消亡之物的故事》

[英]芭芭拉·彭纳等编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柯达胶卷、宝丽来相机、电传打字电报机、斗拱、协和式飞机……85件旧发明,85段各有缘由的消亡故事,多位重量级学者、艺术家、建筑师汇聚一堂,结合严谨的历史考证和深刻的个人反思,回望文明与科技发展的旧时故事。有意思的不仅是这些物品为何消失,还有这些物品的消失给世界带来了何种启示。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整理)